

南朝佛教与文学

晋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佛教与文学/普慧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2985-X

I. 南… II. 普… III. 佛教-关系-古典文学-
中国-南朝时代 IV. I209.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194 号

南朝佛教与文学

普 慧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0³/₄ 印张 · 229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8.00 元

ISBN 7-101-02985-X/B·325



【作者简介】

普慧，本名张弘，男，1959年生于陕北黄河岸边，长于塞上古城榆林、神木。高中毕业后，插队于鄂尔多斯高原，深受黄土高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1979年起，先后就读于陕西榆林师专、西南师大、东北师大、陕西师大、山东大学等校，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榆林师专、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现为陕西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佛教文化”的研究，在《佛学研究》、《文艺研究》、《复旦学报》、《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人文杂志》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著有《白居易与佛教》、《人间苦行与极乐世界》等著作。参编《佛教大辞典》（任继愈主编、杜继文副主编）。

序 二

张弘(普慧)君的这本著作《南朝佛教与文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一九九五年,我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任教的张弘君,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他的论文一出来,就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称赞,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返回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一九九九年又调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近三年来,他在完成相当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大量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对论文又作了补充和提高,仍名《南朝佛教与文学》,交由中华书局付梓,嘱我写序。我作为他的同道,感到由衷的欣喜,于是慨然应允,想借这一机会,谈谈这本著作的写作情况和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胸怀,注重吸收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古代,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佛家的接受。佛家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中经魏晋,到南北朝时期,有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佛家的传播和发展,对我国的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这种影响不只反映在信仰和观念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理论的深层。许多信奉和倾向佛教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是佛教的义理,把佛家的义理同我国固有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等加以比较和通融,从新的视角探讨宇宙万物和人类自身的本性。大量事实说明,由于受到佛家的激发,我国古代许多人的思想理论、思维方

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常常发生在不少文人士身上,如晋宋时期的谢灵运,齐梁时期的沈约、刘勰,唐宋时期的王维、白居易、苏轼、严羽,明清时期的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王夫之、袁枚、曹雪芹等,他们的心性、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明显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给我国古代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这已得到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认同。佛教和文学既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不了解佛教,不探讨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认知和评价我国的古代文学。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二十世纪初期,梁启超就论述了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佛教典籍《百喻经》,让人们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此后,仍有一些学者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这方面的论著较少。近二十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对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有不少分量相当厚重的论著相继出版,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亮点。但是,和古代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相比,和个别国家的研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不论是从研究的队伍来看,还是从研究的水平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显得比较薄弱。至于对南朝佛教与文学的研究,更是缺少全面、细致而深入探讨的论著。这种状况不改变,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是不全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制约。对上述状况,张弘君早有深切的体察。为了弥补这一欠缺,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毅然决定以南朝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研究这一课题,应当说,是有相当大的难度。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属于交叉学科。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传至南朝时,它既保持了自身的一些固有特点,同时又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南朝区域文化的影响,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态。从南朝的文学来看,同以前的文学相比,有继承,也有新变。创作的丰富,理论的建树,成就与局限,都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不只体现在表层上,更重要的是在深层次上的相互通融和渗透。以上这些,表明要研究这一课题,既要对佛教及其在南朝的传播和发展有切实的把握,同时对南朝的文化和文学也要有深入的体察。然后才有可能对南朝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探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对于一个博士研究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确定这一课题时,我作为指导老师,有一些犹豫。但是,张弘君却有一股学术勇气。在他看来,课题既然有价值,即使有困难,也应当知难而进。科学研究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进行的。他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消除了我的犹豫,我欣然表示同意。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完成这一课题的一个结果。

资料是科学研究的根柢。张弘君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为了研究这一课题,他首先本着“竭泽而渔”的精神,尽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先后细致地阅读了有关佛教的典籍和文学方面的总集、别集以及其它方面的资料,全面地阅读了前此有关的研究论著。对所阅读的有关资料,注意鉴别和分析,进而从中引发出恰当的结论。这就使这本著作使用的资料比较扎实、可信,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持之有故,不空泛,有说服力。

研究南朝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做比较全面的观照,一是选择某一点做透视。张弘君选择了前者。这本著作立足于纵横交错,对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思想的衍变,对南朝重要的文人和重要的文学事实同佛教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梳理和论析。这就使这本著作的视野显得相当开阔,有助于读者全

面了解南朝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佛教对文学多层面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问题,并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就我的粗浅的认识来说,方法不能脱离内容,不能先入为主,应当通过对内容的理解来体悟和使用方法。南朝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内容丰富、复杂,涉及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研究这一问题时,可以也应当运用与之相关的多种方法。在这方面,张弘君是很自觉的。他写作本书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运用了宗教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叙事学的方法和发生学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运用,尽管有的属于尝试,但补充了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思考的空间,有了新的多维视角,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科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张弘君的这本著作在继承前贤和时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覃思妙悟,洞察幽微,多有自己的见地。如:第二章分别论述了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弥陀净土信仰和涅槃学与山水文学的关系,指出晋宋山水文学的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受到了大乘佛教的深刻影响;第五章论汉语反切及声韵对佛教梵语、梵唄的借鉴,论齐梁诗歌四声说的形成与佛经的转读、佛教悉曇的关系,能纵观史实而揭示其变化之迹;第七章论志怪小说时,没有停留于题材上的探索,而是从佛教的人生观、时空观以及佛教故事的叙事特点等角度进行论证。这样的论析,辩证圆通,深化了论题。像上面这样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本著作的不少章节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表明这本著作的不少内容,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具有前沿性。

在代代相传的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张弘君是属于跨世

纪的一代。这是幸运的一代。我们刚刚告别了二十世纪,跨入了新的二十一世纪。新的时代,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提出了新的要求。张弘君多年心无旁骛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有相当多的积累,也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我深信他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在新的时代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张可礼

二〇〇一年一月八日识于泉城·山东大学

前 言

(一)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中古^①阶段的一个历史时期，一般是从宋武帝刘裕代东晋称帝的永初元年(420)算起，至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陈后主叔宝祯明三年，589)止，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一百七十年。南朝又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所经的四个朝代的国都皆定都于江南的建康，与北方的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隋等相对，专指南方的四朝。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北方战火连年、兼并频繁、灾疫不绝的社会状况相比，南朝相对来说要稳定得多，尽管其中有刘宋、萧齐皇室内部的残酷杀戮和萧梁后期的侯景之乱。西晋的永嘉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中原，迫使晋王室和世家望族南渡。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大批北方汉族民众的过江，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至南朝，整个南方的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宋元嘉(424—453)、齐永明(483—493)、梁天监至大同(502—545)都出现过“盛世”^②。这样较长时间出现的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

① 历史上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文学史上多指汉末魏晋南北朝为中古。

② 《宋书》卷92《良吏序》：“(元嘉时)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南齐书》卷53《良政序》：“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絃

繁荣,为南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诸如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从事精神活动所需的丰厚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两方面的保障,南朝文化才能得以保证其世族阶层特有的较高品味。

在思想文化领域,南朝继续保持着汉末魏晋以来的思想大开放的优良传统。汉末的社会动荡,使西汉建立的儒家经学的思想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各种思想异彩纷呈,不断涌现。有本土固有的,新出现的,还有外来的。魏晋之际,儒道嫁接而新生的一种思想潮流——玄学,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然而,玄学的影响力和主宰力并不很长久,从它的产生、流行到鼎盛期,只有40年左右,至东晋南朝,虽仍在思想文化界产生影响,但已是“微波尚传”(钟嵘《诗品序》),并逐渐走向衰退、萎缩。南朝的儒家经学虽说失去了原有的霸主地位,但在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方面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受到统治者和世族文士们的高度重视,尊经、征圣、治国、平天下,仍然是广大文士们所热衷奉行的。不过,此时的儒家经学与两汉的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忠”与“孝”这两个宗法一体化社会的两大思想支柱的体系中,把“孝”抬高到了第一位,而“忠”被降到了第二位。这就意味着门阀世族随时可以不受最高统治者的摆布,反映出南朝门阀世族在社会秩序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权。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它的产生是与民众的武装造反连在一起的。从汉魏到晋宋,统治者对道教一直心有余悸,故而采取了不予扶植的政策。直到萧梁,道教一些

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数百。”《梁书》卷53《良吏序》:“梁台建,……四海之内,始得息肩。”这三个“盛世”加起来约有80年左右,将近占整个南朝170年的1/2。

重要人士才受到了帝王的礼遇,道教也因此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影响在思想文化界始终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魏晋的长期传播,由先前方术、神仙的附属品到魏晋玄学的附属品,忍辱负重,一步步地走出外来文化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困境,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认同和接受的宗教。至东晋,佛教便从玄学的附庸地位一跃而起,成为与玄学分庭抗礼的重要的社会思潮。不仅高品味的帝王、名士需要它、青睐它,就连广大的下层百姓也对它的教义和神通顶礼膜拜,深信不疑。佛教已不被视为外国人的宗教,而被看成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宗教。南朝是佛教急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它成为社会思想主流的时期^①。翻开南朝五史,随处可以找到以佛教术语“法”、“僧”、“慧”、“惠”、“昙”、“藏”、“智”等取名的人士。佛教三藏的翻译有了空前的繁荣,汉译佛典总量达 564 部 1100 卷(《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7、8、9)。与北朝佛教重实践不同,义理的研究成了南朝佛教的主要特质。毗昙学、禅数学、俱舍学、般若学、涅槃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四论学、弥陀净土信仰等佛教大、小乘及大乘空、有的各学派纷纷登台亮相,竞展风姿。特别是南朝热烈探讨的“佛性论”,不仅是南朝佛教贯穿始终的基本论题,也是南朝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这是因为它是世俗人性论的屈光折射。南朝佛教出现的学派林立和对义理研究的大量成果,为唐代佛教的全面繁荣和鼎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铺平了道路。与儒家经学相比,佛教经学显得异常活跃、富有生气,而儒家经学,则要沉寂一些。与儒家经学相同的是,佛教经学不再被视

^①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 页。

为一种单纯的出世宗教,它同样被官方肯定为维护宗法社会体系的工具。儒、佛由原来的对立而走向了融合,一治世,一炼心;一立法,一养性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是不甘心划地为牢的,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渗透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人们的生活细节。尤其是在儒家经学相对沉寂,佛教经学异常活跃的南朝,佛教就更容易渗透到其它文化领域,特别是具有广大文士和帝王热爱和耕耘的文学园地,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二)

中国文学发展到两汉,无论是文学的观念,还是创作的经验以及文体的成熟,特别是作家队伍的形成,都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文学自身而言,其自觉性的序幕已渐渐拉开。汉末魏晋,随着思想上“人的觉醒”^①，“文的自觉”^②得以形成,但仍属于初级阶段。汉末魏晋的文学创作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汉末的建安(196—219)文学,一次是西晋的太康(280—289)文学,太康以后至东晋隆安(397—401),文学创作较为沉寂,优秀成果就更少了。帝王从事文学创作的除了建安三曹之外,其余很少。文人的地位也只是在建安时期得到帝王的高抬,其它时间均不甚高。南朝,则是文学自觉的成熟期和高潮期。南朝各代帝王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②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的兴趣和热情,许多帝王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并广纳文士,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帝王为中心和盟主的庞大的文学集团。其中著名者有: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门下的文学集团,萧齐时文惠太子萧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东宫西邸文学集团,萧梁时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门下的文学集团,晋安王萧纲、湘东王萧绎门下的文学集团,陈时后主陈叔宝门下的文学集团等^①。这些文学集团网罗的文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文学集团当中,文学和文人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汉代作家所慨叹的“倡优畜之”、“见视如倡”的尴尬处境已不复存在,文人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毫无拘束地与帝王唱和,并切磋和交流文学创作的技巧和经验,而且在政治上又成为盟主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戴者,如梁武帝萧衍文学集团中的沈约、范云,不但是萧衍知己的文友,又担当萧衍政府的尚书左右仆射,成为萧衍治国的左右臂^②。除此而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家族文学圈和名士文学圈,如“兰台聚”、“高斋学士”等^③。南朝时期形成的文学集团之多,产生的影响之大,是其它历史阶段所没有的。

文人和文学地位的提高,为南朝文学的大繁荣创造了必然条件。儒家经学的衰微,玄学说理的“告退”(《文心雕龙·明诗》),使

① 参见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第6—9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拙文《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③ 《南史》卷25《到彦之传》:“时有彭城刘孝綽、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若‘兰台聚’。”《南史》卷50《庾肩吾传》:“(庾肩吾)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围、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

文学从政治伦理的附庸和玄学哲理的说辞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于是,吟咏、抒发、赞美人的“情性”、“性灵”成为文学最为基本的要求。无论是咏物(自然山水),还是写人(社会活动),主客体的审美成为第一性。声律论的提出和文学创作技巧的日益娴熟,使得南朝诗文的结构日趋模式化。在强调抒发“情性”、“性灵”的同时,美的诗文形式也越来越受到了文人们的喜爱,并成为文人们片面追求的对象。南朝诗文创作因此走上了重形式的极端道路。然而,南朝文学所付出的这种的代价,却换来了唐代文学的高度繁荣,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是值得的。文学在南朝的特殊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使它不能偏寓一隅,它必然要深入到各个领域,来反映它们,表现它们,特别是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而佛教在南朝成为社会文化大背景的主流思潮,文学自然不能不去汇合。这样,南朝的佛教与文学这两大文化潮流就交汇于一起,给各自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契机和特色。

(三)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互相联系着的大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各种子文化在不断地进行着对话和渗透。作为文化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其相互间的碰撞与融合又十分突出。而精神活动中的宗教与艺术的联系又表现得异常活跃与密切。一般说来,宗教与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的现象,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经验来解释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二者在社会功能和反映形式上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二者的积极对话和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给人类的思维、思想与生活方式

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佛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与中国艺术中最大的部类文学的对话和联系,又是非常积极的。佛教从它诞生起,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材料。佛教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十分清楚文学感染人心的魅力,他们在扩大佛教影响力的时候,积极地利用文学手段为其服务。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拉拢从事文学活动的士人入伙。而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宗教精神,需要一定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以此开拓视野,深化蕴含,提高品味。当中国固有的宗教不能满足中国文学的这种需求时,中国文学就会以极大的热情去迎接外来的佛教。佛教与文学的共同需求,使二者一拍即合,密不可分。于是,产生了佛教——文学的文化系统结构。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分支系统:一是佛教文学,主要指佛教典籍中的文学作品(如史诗、诗偈、韵文、譬喻、寓言、变文、讲唱等)、佛教文化体系中的某些文学思想(包括佛典翻译中的原则、标准、倾向等)和佛教僧侣的文学审美活动(包括理论与实践)等。二是佛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指佛教的思想文化体系中的诸多方面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的诸多方面对佛教的影响。三是世俗文学家们的佛教活动(包括文人们的崇佛文学创作),包括他们与僧人的交往,他们的佛学思想和佛教实践等。在这三个分支系统中,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佛教——文学的文化系统结构中最为丰富、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方面。弄清楚它,就能使佛教与文学各自发展的规律和特色更加明晰。同时,了解文人的佛教活动,更有助于把握佛教与文学相互渗透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学和佛教各自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而这两方面是专门的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所较少涉及的,这就是我们以此为题进行研究的意义。

(四)

本书所要讨论的即是佛教——文学文化系统结构中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及文人的佛教活动。时间上为南朝的一百七十年,空间上以南方的活动为主。但在讨论具体问题或现象时,并不受上言时空的限制。佛教与文学在经过汉魏两晋的对话与渗透后,至南朝已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二者的兴起与繁荣是同步的,它们共同为唐代佛教与文学发展的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考察文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文学以外的一些宗教、哲学等的活动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侧面,这对于了解文学家的创作心理机制的构成,是有相当作用的。南朝文人的佛教活动^①,比起汉魏两晋是越来越频繁,以致于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一些虔诚的崇佛文人甚至把佛教奉为思想行动的指南。南朝文人崇佛的程度,恐怕连唐代文人也是望尘莫及的。这是我们系统考察这一情况之前所难以想象得到的。不了解这些情况,恐怕就难以理解文人们的崇佛文学创作和他们为何主动把佛教里的一些观念、方法、术语等引入文学领域。因此,本书在第一章和第三章讨论文人的佛教活动,包括他们与僧人的交往,参加的译经、法会等活动,以及他们奉行佛教戒律的行为,特别是文人参与的佛学问题的大讨论,由此来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从文学的外部来考察的。

^① 这里的文人指具有从事文学活动(理论和创作)能力的人,包括帝王在内。

文学创作虽然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文学家一定的思想观念总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对于崇佛文人来说,他们的佛教信仰、佛教情感和佛教的人生观更是要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此类作品在南朝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定数量。有一些作品能有机地融合佛教与文学,读来清新,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故而本书于第四章分析这些崇佛文学作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流派首先兴起于南朝初期,它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此时思想文化界最为活跃着的大乘涅槃佛性学说的倡导者。这二者不可能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对此,本书第二章专门考察这个问题。

南朝文学尤其是诗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特别注重形式美,而声律的谐调和畅,是诗文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文学声律论的提出,标志着诗歌创作,尤其是五言诗追求声音美由自然到自觉。南朝声律论的重要内容是有关汉语文字四声的发现与四声说的形成。而这一系列的工作又是由一些崇佛文人来完成的。这就使得这一理论与佛教有了一定的联系。本书在第五章中着重考察这一联系。

南朝文学中出现的另一个大的流派是主要以宫廷女性为描写对象的文学派别——宫体文学。这个流派从初发到兴盛到结束,持续了齐、梁、陈三朝。作家众多,上有帝王,下有一般文人,影响遍及朝野。而倡导并予实践宫体文学者,偏偏是一些满脑子佛教思想、行为上又十分检点的君王。这就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道德观与文学观的矛盾。宫体文学的作家、诗人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本书在第六章中力图深入探讨之。

在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学一直是作为主流文学的,而叙事文